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司徒美堂



一、苦难身世 过番少年

革命洪流逐逝波，致公一老导先河。

忠诚爱国输财策，勋业长留史乘歌。

1988年4月，为纪念著名的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先生诞辰120周年，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用饱含着热情的笔，写下了这首为广大海外华侨传颂一时的诗篇。它高度地概括了司徒美堂追求进步、热爱祖国的人生旅程，同时也寄托着后人对这位侨领的无限崇敬和哀思。

司徒美堂原名羨意，字基赞，广东开平县人。1868年4月3日，他出生在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在他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在贫病交加之中离开了人世。家境的贫寒，幼年的丧父，使童年时代的司徒美堂，就饱尝了生活的艰难与凄苦。

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下，司徒美堂慢慢地长大了。为了能使他像别的孩子一样，进私塾读书，母亲起早摸黑，昼夜操劳。正是在母亲的一手操持下，司徒美堂在乡里的私塾里读了四年。尽管当时在私塾里学的都是些“子曰”、“诗云”一类老课本，幼年的司徒美堂对此不甚了了，但他一生的文化基础，却正奠定于这一时期。

10岁那年，他不得不搁下心爱的课本，去新会县县城的一家小作坊当学徒。由于年少体弱，他时常受到县城内一些恶少的欺凌。为了自卫强身，洗刷凌辱，他毅然拜师习武，苦练武功。日久天长的勤学苦练，终于使他练就了一身的好拳脚。

在新会县城的这家小作坊里，司徒美堂跟师傅学做木工活计。作为一名学徒，他不仅要伺候师傅，而且还要照顾师傅一家老小的生活。他的这位师傅为人刻薄，徒弟稍有不慎，就要遭到责骂，甚至体罚。短短几年的学徒生活，在司徒美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许多创伤。他后来曾回忆说：“我的师傅非常严厉，生活变成了一种痛苦。终于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痛苦了。”可是，对于一个家境贫寒的少年来讲，要免遭生活之苦，其出路又在哪里呢？他苦苦地寻觅着，等待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去美国做工的华人回到了家乡。据这位乡邻介绍，美国是个好地方，当地华工都叫它“金山”。听到这里，年少的司徒美堂也不免怦然心动，于是暗下决心，准备去那里闯闯。

1880年3月，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从母亲手中接过告贷来的50块龙洋，从家乡步行至香港，然后再由香港搭乘大火轮“加力”号，只身远渡重洋，去美国“碰碰运气”，争取干一番事业。这一去，他在美国竟前后生活了近70年。

二、寄人篱下 备尝艰辛

19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继第一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84年至1885年，法国又挑起了“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在这同时，北方的沙皇俄国也蠢蠢欲动，企图侵占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地区；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国力的日益强大，也久存侵略中国之心。伴随着东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宰割和掠夺，中国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广东和福建等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为了生计，纷纷下南洋，闯美洲。一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发展其资本主义工商业，还鼓励华工进入当地。但是，随着其开发的渐次完成，便纷纷掀起“排华”逆流。1882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排华法案，一股排华浪潮正在形成。年幼的司徒美堂，恰在其时抵达美国。在后来的一份回忆录中，他曾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我是在旧金山上岸的。我们手拿布袋，穿着中国土布便服，拖着一条辫子，形容枯槁。脚刚踏上码头，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地上脏东西抛了一身。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第一个见面礼。这种侮辱行为决非偶然，美国政府用钱雇些流氓打手，专任此种无耻勾当。”上岸时所受到的这种“见面礼”，使司徒美堂终生难忘。如果说这次见面礼只是使司徒美堂懂得了美国社会并非什么“人间天堂”，那么随后的几件事，则更是叫他明白了寄人篱下的苦楚与艰辛。

第一件事就发生在他刚到美国不久。当时，他在旧金山市中央大道的一家名为“会仙楼”的“杂碎”店当厨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月薪只有12元。在那个排华的年代里，华侨经常遭受到当地暴徒们的袭扰。他们不仅骂华侨是“黄猪”，而且还时常到中国餐馆去吃“霸王饭”。所谓“霸王饭”，就是白吃白喝，稍不顺心，还要砸店打人。他所在的那家“会仙楼”，就成为当地这帮恶棍时常光顾的场所。由于他为人侠义，好打抱不平，而且早年当学徒时还学过武艺，身手不凡，故而，每当有恶棍光顾时，他总是三拳两脚，将其打倒，然后扔到大街上。尽管他刚到美国，对这里的一切还十分陌生，但是，他知道，遍天下的坏人，都是欺软怕硬，因此，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以牙还牙。后来，在另一次与暴徒的搏斗中，他盛怒之下，将对方打成重伤而致死。为此，他几乎被判绞刑。后来，在华侨及洪门人士的大力营救下，他在吃了10个月的官司后获得了自由。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他刚到美国不久。当时，在波士顿的一个地方，当局借口要查一个“私自入境”的华侨，竟把全波士顿的二三千华侨全部拘押审讯。结果，当地华侨所开的店、所住的房子因无人看管，致使财物被当地的流氓恶棍全部抢光。在忍无可忍的条件下，华侨在许多地方发生了抗暴行动，结果死伤很大。据统计，1885年9月仅怀俄明州岩泉城一地，就有19位华侨被杀，伤残达数十人之众，城内的600多名华侨被逐，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全美的华侨连星期日都不敢出门，一旦出门就有

被捉、甚至失踪的危险。

第三件事发生在 1885 年。当时，旧金山地方当局借口华侨住得太拥挤，太不卫生，规定每人住房最少要有 8 尺。政府下令之后，警察和流氓便四处出动，晚上到华侨居住的地方来拉人，拉走之后，再强行关押起来。这便是所谓的“拉房”事件。旧金山地方当局之所以要这样做，当然不是真的要关心华侨的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而是别有所图。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广大华侨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旧金山的许多暴发户修建了大量的新房，由于租不出去，看到华侨软弱可欺，便采取这种手法，企图强行拉广大华侨入住。

一个又一个针对广大无辜华侨的暴力事件的发生，使年轻的司徒美堂终于懂得，在反对清朝廷软弱无能的外交政策之下，广大华侨要想在侨居国取得重大发展，改变这种寄人篱下、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只有团结自助。正如他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既然旧中国这些外交官见美国当局只会磕头，又看不起中国人，华侨在美国的‘外交’方法，只有自己组织社团，团结自卫……也就是说，华侨本身自办外交。”后来，他之所以要参加洪门致公堂组织，并创建安良堂，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三、团结侨属 自强自励

19 世纪下半叶，随着华侨人数的日益增多，在美国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些小规模和华侨社团组织。最初，由于他们屡受当地流氓、警察和移民局官员的欺凌，为生存自卫，故而成立了许多“堂口”、行会等组织。这些小规模的社会组织，对保护华侨的利益，排除地方恶棍对广大华侨的袭扰，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着美国社会排华浪潮的汹涌而来，这些组织则无法在团结侨属、协调华侨与居住国的关系等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这些堂口本身就是宗派性和保守性的组织，往往各自为政，划地为牢，彼此门户森严。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地方当局，看到华侨中的这些社会组织，不利于他们的统治，于是便在各堂口之间，挑拨离间，收买内奸，制造疑忌，然后各个分化，把堂口稳稳地控制在警察或法官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起初立堂结社的义侠主张，逐渐为纷乱迷惘的宗派斗争所冲淡、甚至掩盖。要想维护华侨的利益，加强侨属间的团结，就必须重建华侨社会组织。

为了改变美国华侨组织中的这种落后、被动局面，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侨属，司徒美堂决定利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将有关社会组织予以整顿、改革。几年来在美国的经历，使他增长了阅历，更由于他平时为人肝胆侠义，为保护广大华侨利益，经常奋不顾身，从而使他在美国的华侨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那次因重伤美国流氓而闹出人命案之后，他在美国华侨社会中，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尽管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他失去了工作，但也正因此而接触到了美国社会上上下的各色人物。在恢复自由之后，他前后给人家当过男保姆，当过管家，为人家照看过孩子。1894 年春，他还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上当厨工，随舰游弋了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地，然后又从法国的巴黎返回美国的纽约。在这之后，他又到波士顿当过小贩，用小车推着肉类和蔬菜，沿街叫卖。这种走南闯北的生活阅历，颠沛流离的切身体会，使这位仅受过 4 年私塾教育的中国农村青年，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从而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的华侨领袖打下了基础。

正是本着整顿、改革有关华侨社会组织的愿望，这一时期，他加入了美国华侨社会中历史最为悠久、规模也最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洪门致公堂。洪门本是中国民间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其宗旨是反清复明。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劳工大量进入美国，这一民间组织也发展到了美国。司徒美堂在加入该组织之后，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整顿、改革工作。他首先利用自己的出色组织能力，协调各堂口之间的关系，避免以前连续不断的堂斗。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很快博得了广大华侨的一致称赞，并不久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洪门致公堂的总监理。从此，他便与美洲华侨社会中的洪门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4 年冬，由于考虑到致公堂内情况复杂，指挥失灵，作用不大，因此，他决定在该堂内另立组织。在当地名侨阮本万、李圣策等人协助和支持下，

司徒美堂创立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由于他在美国华侨界有广泛影响，很快使得安良堂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洪门兄弟。他们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宗旨，由小到大，团结了在美的各界侨属。不久，除波士顿和纽约两堂之外，他们还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榄勿顿、圣路易斯、巴尔的摩、克利夫兰、明尼阿波利斯、哥伦比亚、奥马哈、新奥尔良、斯克内克塔迪、布法罗、亚特兰大、哈特福德、诺福克、圣安东尼奥、格林维尔、纽黑文、布里奇波特、纽特、奥尔巴尼、托利等 30 多个城市成立了公堂或支堂，入堂人数也随之剧增，最多时达 2 万之众。在这个规模巨大、分（支）堂林立的社团组织中，司徒美堂被推为“大佬”。在安良堂内，他排行第五，因此洪门人士都尊称他为“五叔”。至此，他已从一个刚刚来美的厨工，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侨领。

在领导洪门致公堂和安良堂的过程中，司徒美堂感到，随着华侨队伍的日益扩大，华侨界的社团组织就不应该停留在原来联络乡情乡谊这一狭窄的范围内，而应该扩展到各个层面，特别是以社团力量，兴办华文学校，开展华文教育，更是刻不容缓之事。因为，一方面，许多老一辈华侨，是从祖国放下锄头和扁担而来到异国他乡谋生的，大多数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写一封家书，要跑出去老远找人帮忙，由祖国寄来的家书，也看不太懂，再者，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他们就业困难，大多数都是出卖苦力，寄人篱下；另一方面，对于生长在侨居国的华侨后代，要想使他们不为当地的文化所同化，始终保持着对祖国的爱恋之情，就必须使他们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正因为如此，在他担任洪门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领导职务之后，便不遗余力地发动和组织当地华侨，创立华文学校。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波士顿的“广华华文学校”、纽约唐人街的“中华公堂”等学校，相继成立。这些学校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简单到完备，为大量的华侨子弟提供教育，有的学校甚至一次招生就达数百人。许多华侨子弟，白天做工，晚上进入学校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通过这种教育，很多华侨后生一方面有了一定的文化程度，另一方面也对祖国的文化遗产和悠久的历史有所了解。在那个世界动荡、交通不便的时代，很多华侨子弟虽然生在国外、长在国外，却一直保持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对祖国始终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和赤子之心，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的开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四、反对清廷 支持革命

司徒美堂童年时代只读过几年私塾，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他天性好学，尤其爱读中国传统的说部之书。特别是明清鼎革时期有关人物的事迹和传说，他基本上都耳熟能详。侨居美国之后，他又阅读了记载明清鼎革之际有关史事的读物，诸如《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等书。书中记载的清军南下时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使他义愤填膺；而史可法、郑成功等爱国名将在民族危亡、国将不国之时的凛然正气和英雄气概，又使他感到振奋和鼓舞。尽管此时的司徒美堂整天还在为衣食住行而东奔西走，但是，振兴祖国的理想，却也在他那颗还很稚幼的心田里悄然萌发。

加入洪门致公堂之后，振兴祖国的思想，在司徒美堂的心里更加明朗化和具体化。正因为如此，他在致公堂内所创设的“安良堂”，长期秉承着反清腐败的爱国主旨。据他的秘书司徒丙鹤先生后来回忆，在当时美国纽约的安良堂总堂内，长期以来一直供奉着民间反清始祖洪英，“五祖”蔡德英、方六成、马超英、胡帝德、李式开，“武宗”郑成功和“文宗”史可法，以及“军师”陈近南等人的神位。在明清鼎革的过程中，这些人都是反抗清军南下的重要人物。据说，当时安良堂入会问答的第一句就是“拜会何事”？一个人如果真的想加入该堂，则其答辞一定是“反清复明”。在司徒美堂的积极组织和倡导下，以安良堂组织为中心，聚集了美国华侨中的一大批反清爱国之士。在后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革命过程中，他们都成了坚定的参加者或热情的支持者。

应该说，早期的安良堂所奉行的“反清复明”思想，还只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促成这一思想与反清革命相结合，则以孙中山先生1904年赴美的革命活动为契机。这一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的身分，去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洪门致公堂以盛大的场面，欢迎他的到来。当地著名华侨黄三德和唐琼昌等人，更是积极奔走，多方协助。当时，司徒美堂还是在波士顿街头沿街叫卖的小贩。但由于他为人侠义，有勇有谋，因此，在与孙中山初次相会之后，两人便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不久，他便担任孙中山的保卫员兼厨师之职，终日追随孙中山左右。后来，孙中山还在他的家里住了5个月之久。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起自己动手做饭，畅谈国家大事。孙先生向他讲述了反清革命的主张，并号召洪门兄弟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目标下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在与孙中山先生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里，司徒美堂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有机会随时聆听孙先生的教诲，他的思想进步很快，初步认识到了要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并表示要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而孙中山先生知识渊博、虚心刻苦、时刻关心祖国命运和民族前途的远大志向与高尚品格，更是让他万分崇敬，钦佩不已。

以与孙中山先生的相识、相知为起始，司徒美堂的思想深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先反清复明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为反清革命的思想所取

代。为了在行动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首先在洪门致公堂内整顿组织，使各地的洪门组织逐渐带上革命色彩。在这之前，在洪门组织内，思想驳杂，参差不齐。特别是康有为等人的保皇维新思想，还占有相当的市场。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流亡到了美国，组织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他的弟子如梁启超、徐勤、欧榘甲、陈继俨等，甚至还加入了洪门组织，直接与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主张相对抗。后来，欧榘甲还积极鼓动致公堂的干事唐琼昌创办《大同报》于旧金山，外表上作为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实际上则是颂扬“天子圣明”的“保皇会”喉舌。后来，正是在司徒美堂等人的积极奔走和努力下，洪门领袖黄三德和唐琼昌终于将欧榘甲开除，并重新任命刘禹成为主笔。至此，《大同报》遂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为配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团结美洲侨属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安良堂成立之后，司徒美堂更是把这一华侨民间社团变成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基地。在他的亲自谋划下，安良堂一开始就公开以支持革命，反对保皇为旗帜。正因为如此，当时在美国的有些保皇派人物，甚至把安良堂的会员称之为“暴徒”，公开加以诬蔑。为了反对保皇派的诬蔑，宣传革命主张，他与安良堂内的阮万本、李圣策、陈光耀等人，时常携带武器，以防备对方的暗杀。

黄花冈起义失败后，国内的革命人士为逃避清军的追杀，聚集革命力量，曾急电在美国的孙中山，要求汇回 15 万美元，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当时的孙中山也是两囊如洗，无款可汇，并因此而一筹莫展，寝食难安。司徒美堂得知后，遂积极奔走，决心为孙中山先生筹到这笔巨款。他原打算叫洪门兄弟自行认捐，集腋成裘。但转面一想，这样一来，由于颇费时日，一定会影响到国内的革命事业。于是，他召集堂内有关人员紧急商量，并建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公堂大楼典压出去，以应急需。他的这一建议，得到堂内各负责人的一致赞同。就这样，他们很快为孙中山筹到了 7 万多港币的现款，并及时汇到了国内。他晚年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许多人奇怪，华侨何以这么热心，平时一毛一分地节省，不在美国花费，叫美国人看了就‘生气’，名之为‘吝啬鬼’，但能于一举手间即筹得 15 万元，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奇怪，其实是美国帝国主义‘教训’的必然结果。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要雪耻就需先捐钱。”1911 年，当武昌起义的消息在美国不胫而走之后，孙中山先生急于回国，其路费也是由司徒美堂等人提供的。孙中山回到国内之后，司徒美堂又发动致公堂成员致电 300 多次，拥护他出任总统。孙中山对司徒美堂的为人和组织能力早就十分赏识，因此在就任总统之后，马上就电邀他回国任总统府监印官，他却以“我不会做官”为由，婉言辞谢了重任。在这之后，他虽然身居海外，却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曾发动华侨社团捐资 200 多万元，作为国民政府的费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就海外华侨对这场革命的贡献作了如下评价：“此次推翻封建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款，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并多次盛赞“华侨为革命之母”。司徒美堂正是海外华侨中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最积极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之一。

五、身在异乡 心系祖国

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其胜利的果实就为袁世凯所窃取。稍后，为了坐上皇帝的宝座，袁世凯竟然不惜出卖国家，以换取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进而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海外华侨一片愤懑。为了配合国内的反袁抗日运动，司徒美堂在美国各地积极奔走，发动广大爱国华侨捐钱捐物。在他的努力下，当时旧金山、波士顿和纽约的绝大部分华侨，都纷纷表示要毁家纾难。他们除将自己的积蓄一概捐出外，还要将商埠中一半的“铺底”抽出，以支持国内的反袁抗日活动。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有料想到，在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而一命呜呼之后，接着而来的则是北洋军阀政府，其屈膝投降的外交政策，比起袁世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司徒美堂后来十分痛心地回忆道，当他动员广大华侨把有关钱物筹集好之后，行将汇出时，“一查中国还不曾有个抗日政府，钱寄回什么地方去？大家没有主意。不得不把钱再分回给华侨”。这件事情过后，美国的有关报纸，把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说成是“五分钟热度”。这曾深深地刺痛了司徒美堂的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1920年，他回国一次。此时，距辛亥革命胜利已有9年。因此，在回国前，他曾猜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国的情况应该比他离家时的情况要好一些。可是，当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回到这块他魂牵梦绕的土地上之后，他才发现在祖国的大地上，依然是满目疮痍，军阀混战，饿殍遍野，为此，他感到十分失望。更叫他难以料想的是，当他从海关出来时，军阀兵痞们还以“检查”为名，翻箱倒柜，形同抢劫，企图在他这位“金山伯”的身上发“洋财”。政治的腐败，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暗淡，使这位少年时代就过番侨居的爱国侨领，陷入了无限的思索之中。

尽管如此，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却始终如一，祖国的兴衰存亡也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军阀内战的硝烟，隔不断他对祖国的一往深情；反对腐朽的现实政治，更加激发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出路的关注。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开展国共合作，举行北伐革命。此时，司徒美堂仿佛看到了国家的出路和民族复兴的前途。于是，在振奋之余，他又奔走在美国各地的华侨组织之中，积极为广州的革命政府和北伐革命作财政上的支持。他还以美国致公堂的名义，通电国内，拥护国共合作。1927年4月，当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时，远在美国的司徒美堂，也通电痛斥他们的反革命行径，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弃孙中山联共革命的阴谋。

六、支援抗战 不遗余力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的大片河山沦于敌手。消息传到美国，华侨各界一片震怒。司徒美堂更是奔走呼号，积极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公开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上海爆发。以蒋光鼎和蔡廷锴将军为代表的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身在美国的司徒美堂得知这一消息后，倍感振奋。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为十九路军抗日的筹款工作中。淞沪抗战结束后，他再一次回到国内，这时他才得知，美洲华侨捐给十九路军的抗经费，只有在汇款时写明由“蔡廷锴将军亲收”字样的、大约占总汇款1/20的款项，真正寄到了十九路军将士之手，其它的则全为国民党最高当局所侵吞。

淞沪抗战之后，爱国将领蔡廷锴来到福建，并发起“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运动失败后，为蒋所迫，蔡廷锴不得不出走美国。司徒美堂在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后，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并主动提出负责蔡将军的人身安全。在他在积极奔走努力下，蔡将军一到美国，就受到了全美各界华侨的热烈欢迎。由于他的精心组织，蔡将军抵达纽约之日，全体侨胞停了生意，带着鲜花，前往欢迎。据说，当时的欢迎队伍中，有300余辆汽车，还有司徒美堂家乡的广东式舞狮子。后来，在他的陪同下，蔡将军还接连遍游了美国的10多个城市，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华侨和美国善良百姓的欢迎。通过这次活动，十九路军的抗日壮举，在美洲的广大华侨中曾得到广泛传颂，同时还使中国的抗日活动，得到美国部分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后来，当七·七抗战发生后，美洲各地的华侨之所以能一呼百应，纷纷支持国内的抗战事业，与这次活动的事先宣传、发动是有一定联系的。

1935年，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出于爱国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以此为契机，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进入了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新时期。事变之后，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的杨虎城来到美国。司徒美堂作为美国华侨界的领袖，亲自发动广大华侨，欢迎杨将军的到来。在会谈中，杨将军十分详细地向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过程，高度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巨大作用和仁至义尽的风范，同时还向他讲述了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中国抗战的前途等问题。这次与杨将军的会谈，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也使他对祖国抗战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同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北平高校学生为主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为了团结国内外一切进步的力量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之中，次年春天，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和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相继在上海成立。这是当时全国学生和各界人士要求抗日救国的爱国力量的大汇合，著名的大众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陶行知先生，就是救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这年秋天，救国会和全国学联派陶行知先生等为代表，前往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向广大的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形势，以推动和促进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11月，陶行知先生一行，经英、法等国，来到美国的纽约。当时，美国的华侨界因长期受到国民党政治宣传的影响，对国内的真实情况很少了解。不少人甚至认为陶行知先生一行，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而来，故而反应相当冷淡。就在这种情况下，司徒美堂挺身而出，对陶先生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先在洪门致公堂内的上下各方面广做工作，接着又在美国华侨界，进行了广泛的说服和动员工作。他指出，在强邻压境、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内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能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就是爱国。他们的到来，就理应受到海外广大侨胞的欢迎与支持。正是在他的努力下，陶行知一行到纽约后，受到了洪门致公堂等华侨组织的热情接待。在与陶先生一行的会见过程中，他仔细地听取了对方阐述的救国会和全国学联关于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具体主张。对于这些，他都完全表示同意和赞赏。

这年11月23日，国内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救国会中以沈钧儒先生为首的7位著名领袖，竟被蒋介石当局下令逮捕入狱。身在美国的陶行知先生等人，就动员美国友人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此事的“不安”和“严重关注”。在这同时，全国学联的有关代表还在美国向广大海外华侨发表了援救“七君子”、揭露南京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运动的呼请书，请求广大华侨签名。司徒美堂得知消息后，也义愤填膺地签了名。陶行知先生在美国的这些活动，深深地震怒了蒋介石，于是悍然下令通缉陶先生。身在美国的陶行知当然不可能被蒋介石“缉拿归案”，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海外各华侨社团中的离间和挑拨，使得陶行知一行，在美国的宣传工作，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司徒美堂在了解了全部真相后，怒不可遏。他认为爱国无罪，迫害爱国人士，阻挠全民族的团结抗日，才是真正的民族罪人。为了全力支持陶行知一行在美国的宣传工作，他除了慷慨资助全部的路费之外，还亲自出面介绍陶行知先生等人，加入洪门致公堂的组织，并通知美国各致公堂的分堂或支堂组织，为陶行知一行的工作，尽可能地提供一切方便与支持。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下，陶行知一行前后由美国东部到西部，并在华盛顿、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费城、西雅图、旧金山等众多城市，向当地的华侨和美国友人介绍了中国抗战情况，从而更赢得广大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抗战事业的了解，争得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在道义上的同情与支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的抗战阶段。司徒美堂知道，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为此，他和旅美的爱国进步人士一起，共同发起组织“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会”，并与宋

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发动广大华侨捐款捐物，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为了使筹饷工作顺利进展，他辞去了其它一切职务，专职于纽约的筹饷局工作长达5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他每天一早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深夜12时，东西奔波，极尽操劳。当时，全美洲的华侨总数仅约20万，经济实力不及东南亚华侨雄厚。但是，在他的精心组织、宣传和倡导下，以额捐（每人每月捐15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公债票等形式，前后捐得数以亿计的巨额款项，有力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据后来的统计，仅当时的纽约一地，广大华侨平均每人就捐了670至1000美元，而且公债和杂捐还不在于其内。

七、身陷敌手 脱险归来

由于司徒美堂对国内抗战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故而当1941年12月初召开“国民参政会”之时，他被邀请作为华侨参政员出席会议。就在他取道香港，正准备回国参加会议时，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年12月8日，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不久，香港、九龙相继沦陷。正在香港的司徒美堂，也成为日本宪兵的阶下囚。当时，驻香港的日本宪兵司令官矢崎在得知他的真实身分之后，即想方设法在他的身上打主意。日本侵略者采用种种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威逼他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并出任“维持会长”之职，以巩固日寇的“占领秩序”，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罪恶目的。身处危境的司徒美堂，大义凛然，严辞拒绝，表现了一个爱国侨领的崇高民族气节和铮铮铁骨。

早在司徒美堂刚到香港之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就为他的安全作了种种准备工作。为了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抗战时局的主张，中共地下组织还安排正在香港的宋庆龄女士，来出面接待他。在接待过程中，宋庆龄女士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国内的抗战情况，同时还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向他作了介绍。香港沦陷之后，身陷敌手的司徒美堂，处境十分险恶。在这情况下，中共地下组织又紧张地筹划营救工作。由于司徒美堂是一个对祖国抗战贡献很大的爱国人士，同时又是一个在海外华侨中享有极高声誉的著名人士，而且年岁较大，行动不便，这就给营救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在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中共地下组织托宋庆龄女士，将营救计划转交给他。对于这一详尽、周密的营救计划，他表示完全赞同。他说：“在我最危难的时候，共产党向我伸出了关怀的双手，可谓患难之交，终生不忘。”于是，就在日寇将要他出任香港维持会长的委任状送到他住地的当天晚上，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掩护下，他化装离开香港，并连夜赶往九龙。后又由九龙，来到东江游击区，再经粤北、广西等地，辗转来到重庆。

1942年1月，司徒美堂几经辗转，脱险来到重庆后，国民党当局对他极力拉拢。蒋介石更是对他亲迎亲送，出则相扶，入则相陪，殷勤之至，且以“国府委员”的头衔相诱，企图拉他加入国民党。此时的司徒美堂，虽然对国民党政权的本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但是，对国民党最高当局消极抗战、迫害民主进步人士、“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以及驻外使馆不管海外华侨生死等问题，还是耳熟能详的。因此，他对国民党的政治表示出相当超然的态度。当蒋介石要拉他加入国民党，并以高官相诱时，他委婉告诉蒋介石，自己是为爱国而回来的，而不是为做官回来的，并说：“谁能出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者，我就拥护他，支持他。我决不加入你们的党。”

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就到他下榻的中央饭店去看望他，并特自为他带去了中共驻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临别时，周恩来还告诉他，中共驻重庆的办事处，还将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欢迎会召开的当天，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了他的爱国热忱及其在美洲华侨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同时还向他介绍了延安解放区和祖国各地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和坚持团结的情况，从而使得他对中国抗战的总体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在这次会议上，他也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讲话，同时还揭露了清廷及各时期反动政府祸害侨胞的罪行。

1943年2月，在重庆滞留了1年多的司徒美堂，决定回美国做华侨的工作。周恩来亲自为他送行，并嘱托他将祖国抗日的重要性及全国抗战的真相告知广大的海外华侨，他都一一应允。回到美国后，他还去了南美洲各国，向华侨宣传祖国的抗战，同时还结识了各地的洪门人士，由此他在美洲侨界的威望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八、组建政党 热心政治

1945年初，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在望，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也即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司徒美堂对抗战胜利后国内的政治前途问题，也开始认真的思索起来。他认为，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海外华侨应该有一个类似政党的组织，以团结广大的海外华侨，参加战后的祖国重建工作。考虑到洪门致公堂成员的众多以及影响的广泛，长期以来一直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故而他主张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这样当会事半功倍。他的这一建议提出后，立即得到了洪门内上上下下的附和。不长的时间内，一切准备工作就已筹划完毕。这年3月12日，“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纽约如期举行。加拿大、美国、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鲁、牙买加等九国的洪门致公堂组织，均派出代表出席。会议结果，洪门致公堂改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全美总部的主席。大会还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的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中国的建设”。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如美国的《五洲公报》、加拿大的《大汉公报》、《洪钟时报》、古巴的《开明公报》、《民声日报》以及秘鲁的《公言报》等，联合其它爱国华侨报纸，发出《十报宣言》，号召“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稍后，各国致公堂都纷纷改为致公党，致公堂的堂员也就成为致公党的当然党员。

同年4月，联合国筹备会议在美国举行。由于司徒美堂长期以来对中国抗战事业所作出的卓著贡献，加之他在美洲华侨界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他遂被聘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华侨顾问。

经历了8年之久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海外华侨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司徒美堂，此时对祖国政治的兴趣，更是与日俱增。1946年初，致公党作出决定：各地派出代表，由司徒美堂率领回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一来能让广大海外华侨亲眼看看战后国内重建工作的真实情况，二来也希望在将来的国内政治生活中，能有海外华侨的相应地位。临回国前，司徒美堂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均表示热烈欢迎，唯独蒋介石不予答复。国民党最高当局如此暧昧的态度，使他的内心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这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国参加“五洲洪门代表大会”。这些离国多年的老华侨，本着一腔爱国之情，满以为美洲致公堂曾为辛亥革命和8年抗战作出过重大贡献，实有功于国家与民族，因此，此番回国，一定会得到政府的热情接待。然而，叫他们痛心的是，一切都是事与愿违。当时，“四大家族”在忙于接收的同时，正磨刀霍霍准备反动内战，因此，根本就不把这批“金山伯”放在眼里。6月21日，在上海市市长吴铁诚的陪同下，司徒美堂前往南京与蒋介石面谈。言谈之中，蒋介石对他在美洲“私自”组党大为不满，并对他主张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

建立民主政府”等言论极为恼火。由于话不投机，会谈不欢而散。

与同蒋介石的会谈相比，司徒美堂在南京与中共代表的会谈，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就在他与蒋介石不欢而散的第三天，他们一行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其间，周恩来向他介绍了抗战胜利后祖国的形势、解放区的民主气氛、大生产运动的辉煌成果等情况。7月底，他还不顾国民党右派的重重阻挠，准时出席了中共代表陆定一和上海各界民主人士马叙伦、黄炎培、陶行知、郭沫若、沙千里等人为他所举行的茶会。会上，双方再次交换了对祖国前途、命运的主张与意见。这个茶会，对他的思想引起了很大的触动，使他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茶会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再次亲赴司徒美堂在南京的下榻之处，与他促膝交谈。他们从国际与国内的形势，谈到中共对于中国前途的具体主张，再谈到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双方不时发生摩擦的本质和真相。如果说在这之前，司徒美堂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还抱有某种幻想的话，那么，经过这次回国后的亲身经历，特别是经过与中共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多次交谈，他已基本认清了事实。自此，他感情的钟摆，已基本定在了为谋求国家与民族和平、幸福、发展、强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一边了。

九、追求进步 反对独裁

就在司徒美堂回到国内不久，蒋介石公然违背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致要求“和平、建国”的真诚愿望，悍然发动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为笼络各界的民主人士，伪“国大”的闹剧此时也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登场。此时的蒋介石，由于军事上暂时得势，更加目中无人。对于国内其它政党和团体，他根本就瞧不上眼。在分配伪“国大”代表的名额时，他只给司徒美堂本人一席代表权，让他代表洪门致公党出席“国大”。对于这一安排，司徒美堂断然予以拒绝。为了使司徒美堂就范，蒋介石又叫江征卿、杜月笙等人前去游说，企图让他屈服。杜月笙甚至还半威胁地说：“蒋介石的为人你可能不知道，他翻脸无情，如果此事使他恼火，你会吃亏的。”闻罢此言，司徒美堂勃然大怒。他告诉杜月笙，“我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都是知道的，我何曾又是一个好惹的人！”一席话，说得杜月笙瞠目结舌，扫兴而归。

当时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司徒雷登在得知司徒美堂与蒋介石“闹翻”之后，也前去说合。他转弯抹角地说，他在中国五六十年，父母的坟山也葬在中国的杭州，他爱恋中国，习惯于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所以与其说他是美国人，还不如说他是“半个中国人”。他还告诉司徒美堂，他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工作了几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完全可以“团结”这些学生，在中国做一番事业，把中国搞好，云云。刚开始司徒美堂还不知对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后来，等明白了对方的来意之后，他再也沉不住气了，于是便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司徒雷登的话。他说：“中华民族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民族，美国人民援助中国，我们很感激。但是，美国的兵、美国的飞机、美国的军舰几乎开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美国的商品充斥了中国的市场；美国政府那样的热衷于搞起中国的内战。很明白，这不是援助，这样下去，中国不亡于日本，也会亡于美国。中国人决不能接受这种命运。”一席义正辞严的言论，说得司徒雷登哑口无言。这就是曾轰动当时舆论界的“两个司徒之争”。

1946年11月，司徒美堂就国内政局，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痛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他说：“数月居沪，目睹国内实际情况，贪污事件层出不穷，工厂倒闭，大部分经济事业为官僚资本把持。此种现象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由于他拒绝出席伪“国大”于先，继而又发表这番讲话于后，蒋介石暴跳如雷。由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日益强硬，他们一行在国内的活动，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叫随同前来的美洲洪门代表全部先行返美，他自己则留在国内，“再顶一阵子”。他估计蒋介石暂时还是不敢加害于他的，天大的事，也不过拼一条老命。对此，他已经置之度外了。

美洲的洪门代表踏上归途之后，上海发生了“摊贩惨案”。出于对四大家族大肆搜刮的不满，上海的一些小商小贩，由不满而走向抗争，结果，遭

到军警的镇压。事情发生后，司徒美堂当即发表讲话，反对国民党特务对劳动人民的迫害，公开站到小商贩的一边。

1947年4月中旬，上海的洪门帮会及青帮等组织，又有为司徒美堂发动“庆祝81诞辰”之举。在用红纸精心印制的长达多页的“寿序”中，赫然有着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吴铁城等国民党大员的名字。此时的司徒美堂，虽然年逾八旬，但他的脑子却异常清晰。考虑到国民党政要的不时软硬兼施，同时更考虑到先前改组的“洪门民治党”早已为陈立夫等“CC派”势力所把持，故而，他决定避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返回美国。

这年7月，司徒美堂离开上海，准备取道香港返回美国。临行前，他起草了一份《脱离民治党声明》，内中声称：“本人主张联合各党派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从事于经济建设。我们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行动。”同时，还声明自己自脱离民治党之日起，不再担任党内的一切职务，回到美国后，将一如既往地从事华侨福利工作。

司徒美堂虽然到了香港，但是，蒋介石依然对他不放心。为了掌握他在港的活动，蒋介石派出了军统特务，名为“侍从人员”，实则对其实行监视，前后达半年之久。旅居香港的司徒美堂，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寡于言辞，陷入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之中。

十、议论国是 拥护中共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变，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度陷入彷徨之中的司徒美堂，终于看清了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希望。尽管他的周围布满了国民党的耳目，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监视和盯梢，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与中共代表和其他在港民主人士的接触。1948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消息，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南洋的华侨团体和香港的民革、民盟、民进、农工、致公、救国会、民促、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司徒美堂终于认识到，以前他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是万难行通的，在民主政府即将建立的时候，他也决不能袖手旁观。

这年8月12日，他在香港建国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及《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和《星岛日报》等十多个新闻单位发表了“国是”主张。这是他在沉寂多时之后，再次用洪门致公堂耆老身分，就国家的出路问题所作的第一次公开发言。他表示：“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的目标。”当时，香港各报都以头条新闻争相发表了这一消息，轰动一时。

这次招待会结束后，司徒美堂与中共代表进行了秘密的会见。中共代表向他介绍了对于时局的看法，并倾听了他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和建议。稍后，中共代表又在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寓所，为他的返美设宴饯行。席间，宾主谈笑风生，憧憬着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及未来的新中国。司徒美堂十分感慨，当即起草了一份《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泽东主席致敬。他着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10月26日，司徒美堂在滞留香港9个月后，离港返美。

离港前夕，他又在香港各报发表了《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新政协的声明》。在这篇声明中，他痛斥“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阐明“谋国之道，旨在和平”的政治主张，指出“剿民内战，元气大伤”的严重后果，并指出“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司徒美堂的这次回国之行，历时2年之久。当他再次回到美国之时，情况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由他一手创办的安良堂，在他走后，已为国民党分子所把持，他原有的人事安排，已被有计划地清除干净。其次，致

公堂自改为民治党后，国内的“CC派”势力逐步渗入，内部陷入四分五裂的涣散状态，一时难以收拾。再次，美国政府为配合国民党的政策，在美国的华侨中采用“拉册”和“查册”等手段，阻挠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司徒美堂并没有放弃努力。尽管原定于在加拿大召开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无法举行，但是，在当地进步华侨青年的支持下，他不顾年高体弱，拖着行动不便的双脚，到美国各地的唐人街去访问、演讲，详细介绍祖国的政治形势，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真相。为了团结广大的美洲侨胞在新中国成立后能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他还在报上发表了《致美洲全体洪门人士书》，回顾洪门人士的爱国历史，揭露国民党不许洪门人士过问政治的阴谋，号召洪门人士切勿为“CC派”所迷惑，要重新团结，切勿内讧。他在声明中还指出，“美洲洪门人当务之急者三事”：其一，要促进洪门团结，与国民党“CC系”一刀两断，清除CC派分子，并与国内爱国民主人士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分工合作，与国内各民族人民一起，共同担负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其二，洪门人士应该全力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其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洪门人士应该回国参加建设，与全国人民一起，担负建国和强国的伟大重任。

司徒美堂的这些访问、演讲和文章发表后，对最广泛地团结美洲的爱国洪门人士，澄清华侨界的是非，打击国民党在洪门中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他不辞劳苦，四出奔走，精诚爱国，再一次在海外的华侨中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十一、回到祖国 迎接解放

1949年初，毛泽东主席在收到中共代表转来的司徒美堂的那封言辞恳切的书信之后，马上给他回信。信中向他介绍了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消息，并告诉他新的政协会议不日将正式举行，请他做好出席的准备工作。不久，司徒美堂接到中共正式邀请他出席人民政协会议的通知，即着手准备返回祖国。消息传到当时也在美国的孔祥熙耳中后，孔祥熙便约请他吃饭，劝他不要被人利用，而且告诉他，既然年纪这么大，为什么还要跑来跑去。司徒美堂知道，孔祥熙所说的这些，无非是要阻挠他返回祖国。于是，他当场拒绝了孔祥熙的劝阻。他说，他之所以要返回祖国，完全是出于自愿，出于自己的一片拳拳爱国之心，并未受任何人的利用。饭后，他考虑到事久生变，可能有人会向美国政府告密，故而于8月9日坐飞机离开美国，来到香港，准备由香港回国，参加人民政协会议。

然而，当司徒美堂一行到达香港机场后，香港当局便派出警车前来“保护”，对他严加防范。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为了使司徒一行顺利、安全地抵达北京，中共地下组织作了种种周密的布置。9月4日，经过长途秘密的跋涉，他终于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北京。

司徒美堂回到北京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早已成为国民党“CC系”御用工具的“民治党”有关人物，还不死心，还想把他拉过去。他们在上海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便手持“拥戴司徒美堂大哥为民治党整理委员会主席呼吁书”潜入北京。司徒美堂得知他们的来意后，严加痛斥，并告诫他们赶快悬崖勒马，再也不要上“CC系”的当。

9月21日，司徒美堂以美洲华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80多高龄的他，一生虽然经历了无数次重大活动，但是，在现在这样的场合，他依然感慨万千，激动不已。在开幕式上，他用最炽热的感情，高亢的声音，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敬，并祝愿祖国蒸蒸日上，繁荣富强。

在政协会议期间，司徒美堂还代表国外华侨民主人士向大会致辞。他说：“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新政府是为争取广大人民利益的，我们坚决表示拥护！同时相信，我们既能把三大敌人打倒，我们就有办法把祖国搞好。比如，我们工业落后，要赶紧生产建设，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的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回祖国来。中国有无尽的宝藏，尚未开发，协助政府把自己的祖国搞好，这是我们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的这番话，不仅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而且也表达了海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在这次政协会议上，司徒美堂还就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根据代表们的一致意见，新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简称上，有些代表则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代表认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的结果，因此应该沿用这一简称。但有的代表认为，这一称谓

应该废除。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司徒美堂十分激动地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0多年来，中华民国给蒋介石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就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这块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示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这一席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马寅初、沈钧儒接着发言，拥护他的这一主张。结果，经一致讨论，还是废弃了简称，他的这一主张终被与会者所采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司徒美堂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出席了这一盛典，并与当时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一起，登上天安门的城楼。伴随着毛泽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洪亮声音，他也像千百万中国人民一样，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是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身居海外的广大侨胞，再也不是失去父母、浪迹天涯的游子了，他们终于有了一个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的伟大祖国！这是他一生都在企盼的事，现在终于变成了现实，他怎么能不激动，又怎么能不兴奋呢？

十二、参政议政 献计献策

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来，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此时的司徒美堂虽然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却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参加了许多重大的社会活动，关心国家大事。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土改，并为此召开了全国政协会议，请各界人士就土改问题献计献策。对于这一重大举措，他是十分支持的。他认为，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因此，他表示：“土改是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生死攸关的大事，土不改，中国无出路；土不改，国家无法富强；土不改，中国革命未算彻底成功。”不过，针对当时部分干部头脑发热，以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土改问题，他则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土改，不能搞一刀切。特别是对于广大海外华侨在家乡所购买的部分土地，应该给予适当的放宽，否则就会损害广大侨胞的利益，使侨胞对新中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为此，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还专门发表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内中指出：“第一，就过去百年情况看，所谓华侨，其实就是破了产的贫雇农，逃到海外，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微薄的工资，积蓄了一点外汇，返回祖国，买田养老，与封建地主的田租剥削大不相同；第二，华侨中，有的兼有自建的乡村洋房，这些东西最好也不要分。因为，洋房之来，是由于他本人的血汗所得，与专靠封建剥削的地主洋房不同。”他的这些意见，不仅合情合理，而且也切中了当时土改过程中不问清红皂白、处处一刀切的弊病。只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他的这一中肯意见未能为有关方面所接受。

1951年3月初，司徒美堂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分，自北京南下，前往广东侨乡新会、江门、开平、台山、鹤山等地观察土改情况。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昔日贫穷落后的家乡开平县和其它周围各县，此时已经普遍地组织起来了，耕作方法也正在改变，农业生产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在视察他家乡的邻县时，他还发现，经过土改，这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前肆虐一时的所谓“三毒”——土匪、赌博和鸦片，现在已完全消声匿迹。以前这里的农业是靠天收，所谓“大雨发大水，小雨发小水”的农谚，正是这种依赖自然条件的典型写照。但是，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除了修建成大规模的水利设施之外，还新建了水力发电厂。看罢家乡如此喜人的形势，86岁高龄的司徒美堂，也禁不住热血沸腾。他后来在一篇向海外华侨介绍自己故乡情况的文章中，曾不无感慨地写道：“在我漫长的一生经历中，我看到了许多变化，但是没有有一个能与我可爱的祖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相比；”“解放前很多年，我一直为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痛心疾首。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新的

生活已经开始，这也是我为什么并没有真正感到老的原因，我的心是年轻的。我很高兴我最后还能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和自由，贡献我微薄的力量。”

抗美援朝的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内有一些人，存在着亲美、崇美和恐美的思想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司徒美堂以一个在美生活近 70 年的老华侨身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美援朝主张。他认为，和美国人打交道，不打不相识，只有立足打，打了以后，才有和谈的可能。为了揭露美国的侵略面目，反对有些人亲美、崇美和恐美的思想，他还口述旅美 69 年的生活经历，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剖析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向那些不了解美国的人，分析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痛述广大旅美华侨百年来在美国的遭遇和牺牲。这一口述后来经整理，在《光明日报》上连载，并为多家报刊所转载，后来还出版了单行本。毛泽东主席在看了该书之后，也多次当面称赞他“写得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这本薄薄的小书，其意义的确是非同寻常的。

十三、筹划侨务 心系侨胞

晚年的司徒美堂，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半生飘泊在异乡他国的老华侨，他的心却时刻都在惦记着广大的海外侨胞。他知道，广大的海外华侨由于种种原因，对新中国可能有不理解之处，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是希望国家独立、富强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沟通海外华侨与新中国的联系，他亲自给旅美各地的侨胞及洪门兄弟提供自己在北京的住址。他还通过各种途径，告诉各地华侨：“今后不论华侨有何种困难，何种意见，何种要求，望能以兄弟谈心之态度，多向本人提出……在可能的范围内，必当为各位向政府反映，请求协助解决，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而努力！”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向政府和人民讲述海外华侨界的情况，讲述华侨与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

在他刚刚回到北京不久，国民党和海外的一些反华势力便竞相造谣，说他已经被共产党斗死，这事曾在海外的华侨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了揭示其中的真相，消除侨胞中可能出现的误会，他多次通过报纸、广播等形式，向广大海外侨胞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介绍自己回国定居后的各种情形。他说：“反动派造谣说我被斗死了，但我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教育下，更健康、更年轻了。每餐两碗饭，不能缺少！”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侨胞，“我以华侨身分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我亲眼看见庄严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和国际人士喝彩声中诞生；我亲眼看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代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华侨开诚布公，诚恳亲切地协商国事……根据我4个月来的经验，我认识到中央人民政府是真真实实、不折不扣的人民民主政府。这政府是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内民主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共同组成的。”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国际上一片反华叫嚣的严重关头，他的这些讲话，对澄清真相，宣传新中国，沟通新中国与广大海外侨胞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新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他还竭诚为广大的海外华侨提供各种服务或帮助。他告诉海外侨胞，百闻不如一见，要知道新中国的实际情形，就应该尽可能地回国看一看，走一走。每逢海外华侨寄来函电，或问时局，或提意见，或陈狐疑，他都用书信、广播或著文等形式，予以详细的解释。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归侨和侨眷怕沾上“海外关系”，不敢与国外的亲友通信，有的甚至拒收国外亲人的汇款，以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特别是抗美援朝开始后，一些美国的侨眷更是谈美色变。司徒美堂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要求政府重视这些问题。他多次向有关侨眷解释说：中国共产党的侨务政策是鼓励归侨和侨眷加强与海外亲人的通信联系，促进华侨团结爱国，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加强国际友好合作，保护

国内归侨和国外华侨正当利益的。他还结合自己对欧美华侨各界有关情况的了解，认为欧美华侨中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是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有的还是国内外第一流的名家。尽管他们对新中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理解，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爱国的。因此，他建议政府一定要创造条件，打消他们的顾虑，欢迎他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1955年在国务院专家局的领导下，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接待处”，同时还批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鼓励和协助留学生家属与国外亲人通信联系。从此，不少解放前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归国定居，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50年代初，不少海外华侨为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把子女送回国内读书。对于这些回国就学的华侨子女，司徒美堂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就读于中等学校的一些归侨学生，因患肺结核和关节炎等慢性疾病，需要一段较长的休学与疗养，而学校限于条件无法解决，为此不少侨生产生了苦恼，严重影响了学习情绪。于是，部分侨生要求出国，身在国外的家长也为此忧心忡忡，来信来访要求侨务部门给予照顾。当时有些人片面理解“一视同仁”，强调侨生考入正规学校后，其学习、生活等问题应由所在学校统一安排，不能有所特殊。司徒美堂得知后，认为此事关系到国家的侨务政策，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到海外华侨在侨居国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也会挫伤他们送子女回国就学的积极性。他向有关部门反映说，归侨学生家在国外，患病之后长住学校集体宿舍不利于身体的康复，因此侨务部门应该予以适当解决。在他的努力下，稍后北京侨联经上级批准，在西城区办了一个归侨休养所，供侨生中的长期病号疗养。仅1955年一年，该休养所就接受了252名侨生进所疗养。经过半年到1年的疗养、休息，全部恢复了健康，愉快地返回到原就读的学校或工作单位。许多身在海外的家长在得知孩子身体康复后，纷纷来信感谢政府对其子女的关怀和照顾，同时也对司徒美堂处处为华侨利益着想、时刻关心归侨子女，表示谢意。

在司徒美堂晚年的社会活动和侨务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关于建立华侨银行的设想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各种努力。作为一个在异乡他国艰苦奋斗了数十年的老华侨，他深知华侨在国外创业的艰难和辛酸。很多华侨在国外艰苦奋斗多年之后，便将其血汗所得，寄回国内，赡养家人，这就是侨汇的来源。近代以来，源源不断的侨汇，对繁荣侨乡经济，促进侨乡生产，支援祖国建设，都曾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侨汇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抗战经费。然而，在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只知道搜刮侨汇而不问华侨的疾苦。当时，华侨寄回的侨汇，照例由中国银行办理。而当时的银行，事实上是一个官僚机构。因此，侨汇一到，便按当时汇率折算成法币，发函通知散处各地的侨眷或侨属，等到他们收到通知时，所折合的法币早已大大贬值。司徒美堂清楚地记得，一位台山籍的陈姓华侨，抗战前自己辛苦得来的侨汇换成大洋5000元，存入中国银行，可等他1948年12月去取款时，

大洋折成法币，连本带利只有四角五分，仅勉强能够买半斤米。广大华侨饱受国民党金融机构的盘剥，怨声载道。可是，国民党华侨事务委员会却对广大华侨的呼声，不闻不问，置若罔闻。在这种情况下，司徒美堂觉得应该办一个华侨银行，以处理侨汇，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因此，他于1942年返回重庆后，当著名华侨荆有岩等人发起组织“华侨兴业银行”，并邀请他出面领导时，他便欣然同意。后来，在这个银行正式成立后，他还被选为首席常任董事（相当于后来的董事长）。

司徒美堂在加入华侨兴业银行之后，和侨务界的联系极为密切，归侨和侨界的有关人士，都经常到他那里聚会。一时间，不只美洲华侨与他联系密切，南洋华侨也多与他有着很好的交往。以经营万金油起家的南洋名侨胡文虎，在到达重庆时，就曾到当时设在重庆的兴业银行写了增资认股书。在银行内，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诉同事，华侨兴业银行一定要办成为广大海外侨胞所满意的银行。1943年他回到美国后，便开展了大规模的募股增资工作，并派出该银行职员，赴美留学，专攻银行业务。经过他与其他同行们的努力，华侨兴业银行在抗战时期那种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还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到1943年，该行的总资本比初创时增加1倍，总额达800万元。除重庆总行外，大后方的昆明、韶关、成都、灌县、兰州、西安、平凉、界首、老河口等地，都设有分行或办事处。这一银行的设立，为保护海外侨胞的权益，最大限度地利用侨汇，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曾起着积极的作用。

正是因为他有着这样一段经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当他兼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之职时，他就把组建华侨银行的事宜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提交国家有关方面讨论。他认为，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人民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的百废待举之时，大量的侨汇，正是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一笔难得的资金来源；而对于广大的海外华侨来讲，有这样一个专门的银行来处理侨汇，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周折和不便。1952年，他把自己的这一设想正式付诸实施，并起草了计划。根据计划，该银行取名为华侨建设银行，总资本20万美元，其中侨资占2/3，国内资金占1/3。为了使计划得以落实，他还专门为此事去找过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老人。后来，由财经委员会批交中国银行拟出意见，经多次协商后，认为此举既满足广大海外华侨长期以来希望国内能有一个专业银行以办理侨汇的愿望，同时也可借此沟通政府与广大华侨和侨眷联系，并可作为吸引侨资回国投资的重要媒介，因此很快得到认可，并颁发了营业执照等法定文件。为了使该银行能尽早开业，中国人民银行还向司徒美堂建议，在侨资一时还无法正式到位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先行垫款，以助其成。对于政府的这种关心，他十分感动，但鉴于该行以侨资为主的建行宗旨，他还是主张等待时机，俟侨资逐步到位时，再行开业。然而，此时的司徒美堂，毕竟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尽管他在海外的华侨中有着崇高的声望，但身体和年龄的情况都不允许他再到海外作长途的奔波，以组织和动员广大华侨参加募集

股金的工作。因此，创办银行的计划，也就只好被搁置了。

司徒美堂创办华侨银行的计划虽然被搁置，但是，他在人生的暮年还能身体力行，想广大海外华侨之所想，急国家和人民之所急，为华侨的事务鞠躬尽瘁，贡献毕生精力的崇高精神，却一直为人们所敬佩和景仰。

十四、爱国侨领 汉史留芳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安居北京、度过了6年平静、幸福的晚年生活之后，因脑溢血病逝世，享年89岁。

司徒美堂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华侨事务委员会，组织治丧委员会及安排有关治丧事宜。在他逝世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就向全世界播发了讣告，并公布了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次日，他的灵柩移到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灵前摆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送来的花圈。

10日上午，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堂为他举行公祭。公祭大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陪祭的有陈云、林伯渠、李济深、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在廖承志所致的悼词中，对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司徒美堂先生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道路，也是1200万国外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他们正在走着拥护祖国与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这可以说是对司徒美堂一生所作所为的最好概括。

1985年5月18日，司徒美堂的家乡开平县的县委和县政府，为了表彰他爱国护侨的光辉业绩，决定为其建造纪念馆。消息传到海外后，海外的中文报纸如加拿大的《大汉公报》等纷纷刊登报道。由于海外侨胞对司徒美堂素怀景仰之情，欣闻建馆，便争相赞助，前后捐款达300多人次，捐款达80余万港币。不满1年时间，就筹措到了基建经费。一座建筑面积达1400多平方米的司徒美堂纪念馆很快就建成了。1986年10月31日，座落在开平县长沙侨园宾馆内的司徒美堂纪念馆正式落成，是日举行了盛大剪彩典礼。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嘉宾及国内各界著名人士200多人参加了盛典。这也是开平县自建国以来，海外嘉宾出席最多、场面最为热烈的一次庆典活动。

1988年4月3日是司徒美堂12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忠贞的爱国者，激发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联合编辑出版了《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一书。该书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同志作序，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同志、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同志以及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等也为本书题词。正如叶飞同志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司徒美堂一生的光辉业绩，是美洲华侨的旗帜，与代表东南亚爱国华侨的陈嘉庚先生交相辉映。”是的，司徒美堂那彪炳史册的爱国业绩，不仅永远为亿万炎黄子孙所崇敬、所景仰，而且还会激励全国人民和广大的海外侨胞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